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研究

梅星星^{1, 2}, 杨志清¹

(1.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11;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在乡村振兴、农业强国战略布局下, 从国家政策、学术研究两个层面提出高素质农民及其培育的内涵和特质, 继而梳理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逻辑, 认为农民素质培育演变过程表现为传统农民—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 其演进现实逻辑主线为从“谁来种地、怎样种地”到“谁来治村、如何兴村”再到“谁来引领致富、如何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 分析高素质农民培育成效及困境, 从政策法规、组织管理、教育培训、考核评价等四个方面探讨未来趋向把握。最后, 构建高素质农民“3311”培育体系, 体现其实践价值, 并从精准遴选培育对象、精准设置培育内容、精准配备师资队伍、精准选择培育方式和途径等四个维度, 提出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运行中应把握的细节, 以期对后续政策实施和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乡村振兴; 高素质农民; 培育体系; 农业强国;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511 (2024) 03-0026-17

DOI: 10.19808/j.cnki.41-1408/F.2024.0022

一、引言

在国家政策等宏观层面, 党的中共十八大以来, 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尤其是自布局乡村振兴、农业强国战略以来, “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迫切需要与其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陆续出台政策文件, 聚焦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 体现出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战略重要性。

在农业产业生产经营及乡村组织管理等中观层面, 随着人工智能、生物信息、绿色低碳等新兴技术和新发展理念普及, 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进程加剧, 传统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及乡村治理模式也在发生变革。在农业产业发展模式上, 农业生产经营呈现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 组织形式上,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化需要高素质人才。此外, 在乡村治理方面, 随着“千万工程”全面推广, 奔向共同富裕需要一批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高素质人才。

在高素质农民培育等微观层面,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 在全国31422万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 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7.1%, 大专及以上程度的占比1.2%, 这和占全国人口31.6%的

收稿日期: 2024-1-17

基金资助: 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360A08-07-2020-0025-1); 2024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本科教育类 (2024SJGLX0539);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024XJJYXM4)

作者简介: 梅星星 (1986—), 男, 河南洛阳人,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副教授,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博士后,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杨志清 (1970—), 通信作者, 女, 河南汤阴人, 博士,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 农业经济管理。

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者相比尚有差距^[1]。2023年农村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7.9%，是城镇居民的49.0%。从收入来看，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1978年约为2.6，2023年约为2.4，乡村对高素质人才吸引力有限。从三产占GDP比例看，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GDP的7.1%^[2]。农业农村发展状况，致使高素质人才扎根乡村、服务农业的第一意愿不高。此外，随着乡村人口流失及老龄化，乡村人才队伍质量也有所下降。因此，激发更多高素质人才内生动力，培育大批高素质农民汇集乡村、服务农业，具有时代紧迫性。

因此，在国家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等战略布局下，结合农业产业从业者及乡村组织管理者整体素质水平、新生代“涉农”领域就业创业意愿等状况，系统研究高素质农民高质化培育，具有较高理论和社会价值。

二、高素质农民及其培育内涵解析

（一）高素质农民

1. 高素质农民政策演进脉络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农民素质提升工作，并在不同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农民培育工作重心。因此，“高素质农民”是一个顺应时代而生，具有较强政策性的概念。通过对政策文件、学术研究成果梳理，本文认为高素质农民形成过程表现为传统农民—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其演进的现实逻辑主线为从“谁来种地，怎样种地”到“谁来治村，如何兴村”再到“谁来引领致富，如何共同富裕”，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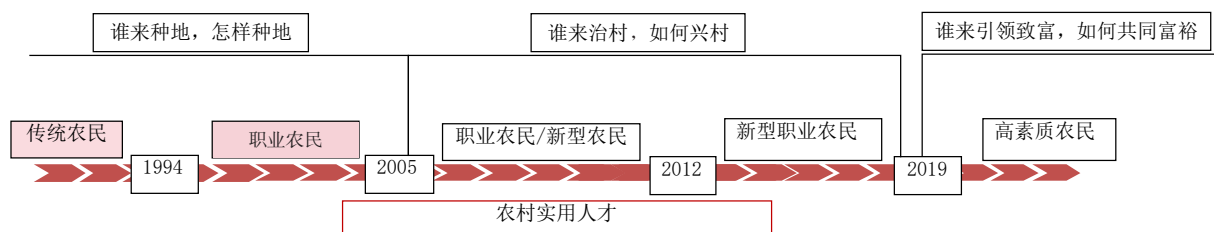


图1 高素质农民演变轨迹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繁荣，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流向非农产业，导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状况持续到21世纪初，农村大量耕地荒芜，出现土地非粮化、非农化现象。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自此农村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2005年，原农业部针对“谁来种地，怎样种地”问题，颁布《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正式提出要培育农村实用人才；200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关于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意见》，其中，对农村实用人才给出官方界定；2010年，原农业部出台《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将农村实用人才划分为生产型人才、经营型人才、技能服务型人才、社会服务型人才和技能带动型人才等5种类型，分类实施培育，对其社会定位是农村劳动者、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该提法直到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实际上，在2013年前的相关政策文件当中，农村实用人才、新型农民的提法并存，农村实用人才等同新型农民，以区别于传统农民；以后的政策文件鲜见提及“农村实用人才”，如表1所示。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也面临新的发展形势。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3年，原农业部颁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等3种类型。在这个历史阶段，其社会定位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以支撑乡村振兴（如表1所示）。

党的十九大以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朝共同富裕目标奋进，三农工作更是如此。2019年，自“高素质农民”被提出后，国家陆续出台政策文件，关注高素质农民全面发展。高素质农民政策含义，是对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继承发展，不仅在延续“新型”基础上强调农民的职业身份属性，还对新型农民在经营管理、专业生产、技能服务等素养方面有更高要求。回顾这段历史时期政策，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乃至农业强国建设的人才需求，对其社会定位是，通过农民的全面发展，对农业、农村服务能力更强，并具备有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能力（如表1所示）。

表1 “高素质农民”政策演变

年份	文件提法	范围及定位	文件名称	颁发部门
2005	农村实用人才	具有中专学历的从事种植、养殖、加工等生产活动的人才，以及农村经营管理人、能工巧匠、乡村科技人员等实用型人才； 具备带头致富和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	《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	农业部
2007		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为农村经济和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服务、作出贡献，起到示范或带动作用的农村劳动者； 广大农民的优秀代表，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关于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0		5 种类型：生产型人才、经营型人才、技能服务型人才、社会服务型人才和技能带动型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	农业部
2012	新型农民	以提高科技素质、职业技能、经营能力为核心，大规模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养	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2013		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2006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2007		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2008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2009		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培养新型农民		
2012	新型职业农民	对未升学的农村高初中毕业生免费提供农业技能培训	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2013		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 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农业部办公厅
2013—2018		全日制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有志投身现代农业建设的农村青年、返乡农民工、农技推广人员、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和退役军人	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2017		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	《“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	农业部

(续表1)

年份	文件提法	范围及定位	文件名称	颁发部门
2019		乡村需求；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
2021	高素质农民	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创办领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带头人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1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运用农业农村资源和现代经营方式增加收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国家发改委
2020—2023		提升其服务农业、服务农村的能力，提升高素质农民服务农业、服务农村的能力	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2. 高素质农民内涵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提出，“高素质农民”是一个由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而来，具备“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特征的农民群体，他们现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力军^[3]。此后，对于高素质农民内涵的理解，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

彭超研究表明高素质农民应具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力^[4]。李谷成研究则认为高素质农民比新型职业农民“更有文化、更懂技术、更会经营”^[5]。李莉研究发现高素质农民呈现四方面变化，他们更具政治和文化素质、农业生产技能和终身学习素质、经营素质、管理素质^[6]。温涛研究则表明高素质农民除了需要具备以往新型职业农民能力之外，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技术迭代升级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五个方面进行了延展^[7]。袁华根研究发现，高素质农民是那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较为年轻、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或者掌握先进农业专业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带头人，包括青年农场主、农业职业经理人和各类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8]。吕莉敏研究则表明高素质农民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的升级版，他们是一批具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资金积累和职业素养，热爱农业农村的中青年高素质农民，其职业理念新、职业素养高、职业情怀深、经营范围广、带动能力强^[9]。

前人研究各有侧重，且更加尊重农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体现出国家对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的考虑；同时，前人研究也有共识，即高素质农民在专业素养上要有本领，不仅有文化、懂技术，还得会经营、善管理，支撑乡村振兴，在政治素养上要有政治责任，不仅有情怀、懂农业，还要爱农村、爱农民，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此外，还要有体魄素养、创新创业素养等，能满足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需求。

基于此，本文认为，对高素质农民内涵的理解是对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继承发展，不仅强调职业农民的职业身份属性，还在延续“新型”的基础上强调高的素养。应通过完善的培育体系，培育出具备较高思想政治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生产技能素质、运筹管理素质、司法维权素质、社会服务素质等，能充分应用农业新质生产力，来建立起自我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良性互动，最终实现自我驱动、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新农人。

3. 高素质农民特质

本文指出的高素质农民内涵，不仅从“劳动者”角度来理解其应具备的知识、技能，还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强调其具备更高的政治觉悟、职业道德操守、历史责任感以及更健康的身心。其目的指向更多是“实现个人价值”，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因此，在新阶段，高素质农民内涵核心在“素质”，关键在

“高”。据此，本文从意识形态层面、业务技能层面、个体身心层面等三个维度对“高素质农民”的特质做解释（如表2所示）。

表2 高素质农民特质分解

层面维度	内涵表现	具体要求
意识形态层面	思想政治素质	较高的政治觉悟、职业道德操守、历史责任感、“三农”情怀
	科学文化素质	较高的学历，较强自我学习能力
	生产技能素质	较高的职业资格和实操能力，能充分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
业务技能层面	运筹管理素质	较高的组织、沟通、管理、协调、应急能力
	司法维权素质	较高的知法懂法用法能力
	社会服务素质	较高的为农服务、联农带农、引领致富的能力和丰富的社会资源
个体身心层面	身体心理素质	较强的身体体魄，更健康的心理

（二）高素质农民培育

1.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演进

高素质农民培育是一项以政府主导的兼具公益性和基础性的长期工作，其政策演进路径表现为绿色证书培训工程（1994年）—跨世纪青年科技培训工程（1999年）—新型农民/农村实用人才培育工程（2005）—新型职业农民培育（201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2019年）^[10,11]。

提升农民素质的工作从政策演进路径看，有“培育”和“培训”之分，两者均是以政府为主导，结合当时国内政策、市场需求等环境，通过平台体系对各类农民开展的能力素质提升工作。然而，“培育”与“培训”亦有差异：培训主要针对问题的解决，注重某项专业技能的传授，多是阶段性、短期性，甚至是一次性行为，对受培农民来讲，缺乏系统性、持续性学习；培育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除了传授专项技能外，更关注综合素质的挖潜与提升，是一个系统性过程，高素质农民培育即是如此。

2.高素质农民培育学术研究

“高素质农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产物，该概念在2019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被首次提出。在此之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职业农民及其培训或培育。因此，在知网，检索“高素质农民培育”有以下结果：作为主题词，共检索2176篇；作为篇名，共检索776篇；作为关键词，检索299篇，且集中于2020年以后^①。以High Quality Farmers为关键词，在知网仅检索到1篇外文文献^[12]。

孙伟的研究表明高素质农民培育意义及价值重大，加强思想教育有利于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成果，加快推进传统农民现代社会身份转变，提升农村社会文明水平^[13]；于兴业则研究其价值外延，认为在数字劳动视域下培育高素质农民具有理论价值、目标价值与耦合价值，可有效缓解农村教育滞后、农村空心化、农民劳动异化短板等“三农”问题^[14]。龚武滨、李雪、张贻茜等学者通过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育评价指标体系，对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不同地区、不同领域效果有一定差异。同时，受培人员的身份、年龄、收入、产业所在地等个体属性对业务影响具有差异^[10,15,16]。

有学者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运行机制，认为高素质农民培育运行是在政府主导下目标导向机制、政策驱动机制、改革创新机制、环境营造机制、多元化发展机制、监督约束机制等多种机制协同推进的^[17,18]。关于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有研究认为，较为典型的模式有“田间学

校”模式^[19]，“阶梯递进”模式、“多元联动”模式和“数智循环”模式^[20]，“12335”农村远程教育模式^[21]，新型职业农民产教融合培育模式^[22]等，这些模式为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提供了参考样式。关于高素质农民受培意愿及影响因素，有研究认为，性别、是否进城市务工、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年收入、用工雇佣等因素均对受培意愿影响显著^[23]。已有研究对职业农民培育关注较多，也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不论是政策的连续，还是前人成果积累，都为高素质农民培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价值意义、发展瓶颈、运行机制模式、受培主体意愿、培育绩效等领域，结合国家战略布局对高素质农民培育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梳理不够，对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架构以及实践验证研究有待深入。

3.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架构

高素质农民培育基于完善的培育体系实施，即由培育客体、培育主体、培育媒介、培育环境等协同完成（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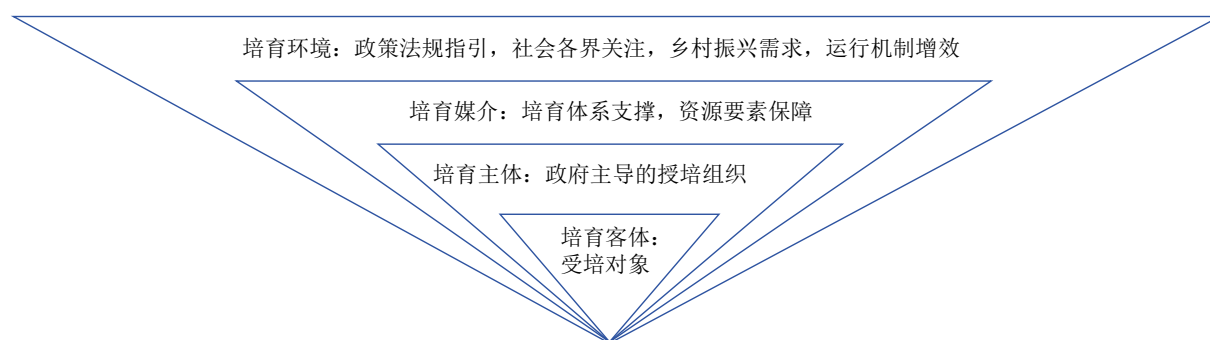


图2 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架构

培育客体是接受培育的各类人群；培育主体以政府为主导，由推广机构、院所学校、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培训机构等构成；培育媒介是指人才、科技、资金等各类资源要素所构成的软件设施，以及由培育场所、空间、基地、设备等所构成的硬件设施；培育环境是指当期的政策法规、社会认知、运行机制、市场需求、乡村振兴及产业发展需要等。高素质农民培育以经营管理型、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为目标导向开展，培育内容围绕特质的“三个维度七个方面”，主要包括为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所设计的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线上学习、现场观摩、交流实践、指导服务、绩效评价、信息宣传、统计监测等内容（如表3所示）。

表3 高素质农民培育类别及目标^②

类别	目标
经营管理型	培养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农业产业领军人才（农业企业家）、创新创业带头人、农业经理人和乡村治理带头人
专业生产型	培养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并直接从事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的高素质农业劳动者
技能服务型	培养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农业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和乡村社会事业服务人员

4.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理基础

高素质农民培育是基于我国“三农”事业发展的实践基础而作出的科学决策，具有充分理论依据。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发现人力资本理论、产业链理论、劳动分工与协作理论、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理论可以为其提供理论资源和学理支持，并为未来深入研究打开思想和认知空间（如表4所示）。

表4 高素质农民培育主流理论依据一览

理论学说	核心观点	高素质农民培育依据
产业链理论	一是产业链是包括供应商、生产制造商、分销商、最终消费者以及物流和信息流的一个系统； 二是农业产业链的构成要素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各个经营主体	一是高素质农民有利于提高专业化生产和服务水平、组织化程度； 二是高素质农民培育有利于建立农业产业链更佳模式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一是人具有多层次心理需求； 二是在低层次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高层次需求； 三是人的内在需求是激发人主观能动性的源动力	一是温饱已经满足了农民最低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求； 二是农民需要成为一个被社会尊重和认可的体面职业； 三是高素质农民成为一个需要认证并且有地位、有尊严的新兴职业
人力资本理论	一是人力资本是构成财富的第一因素； 二是人的素质不同，劳动能力也有所不同，“技能”价值贡献较大； 三是培训提高技能，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农民识别和解释市场信息的能力，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四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	一是教育与培训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能提高农民自身素质与能力，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社会影响力； 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农业生产量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
劳动分工与协作理论	一是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变化会引起价值量变化； 二是把组织视为一个系统，组织内各子系统及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实现组织目标和提高组织效率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系统为了生存和维持下去，必须实现“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潜在模式维持”	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各农业经营主体会根据各自性质与功能，形成专业化分工及相互协作的网络系统； 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可以视为作为一个系统，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高素质农民是一类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对系统的生存、维持、升级作用重大
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	一是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二是农村人口外流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影响，也给农业农村带来发展契机； 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将改变传统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诱导技术变迁，发挥农业技术先导作用	一是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将提高务农者的技术要求； 二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及务农劳动者收入也随之提高； 三是高素质农民培育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职业农民的产生与发展，促进农业升级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一是是一切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服务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以人为本”是消除劳动异化的关键； 三是教育和学习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一是把农民作为一种职业，体现对农民个性和自由选择的尊重，能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培育”是在知识涵养基础上，更加注重农民职业素养提高和价值实现 ^[24]
新公共服务理论	一是政府的职能是服务，政府追求的是公共利益； 二是战略性思考、行动上民主； 三是服务于公民而非顾客； 四是责任并非单一，应该对相关制度和标准等复杂因素负责； 五是要以人为本，重视公民权益	一是为提升农民农业科技知识、文化素质等服务，体现政府为公； 二是培育根据农民需求设置，“自下而上”开展，符合新公共服务理论中思想上的战略性、行动上的民主性论述； 三是互利合作，社会主体参与授培，政府支持，培育潜在人力资源，体现以人为本

5.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价值

高素质农民区别于传统农民，他们具有特殊的职业使命，彰显其特有实践价值。张桃林研究表明推进农民教育培训更好可以适应农业科技进步、现代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新要求^[25]；徐进研究则表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可以破解“谁来种地”困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破解乡村人才发展瓶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农业现代化^[26]；李谷成研究证明了高素质农民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并赋予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新内涵^[17]；丁刘慧子研究发现高素质的职业农民有利于分散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国家资源有机衔接，进而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生产发展和农产品现代化经营^[27]。也有研究结果表明，高素质农民有利于增加农业生产性投入，吸引外部投资，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促进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和新技术带来的增产增效。

基于前人研究，本文认为高素质农民具有更高科学素质、具备新发展理念、具有较高精神文化

修养、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对于促进农业现代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增强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人翁”地位不可或缺。同时,高素质农民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核心力量,他们可以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这同样是也是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价值的体现。

三、高素质农民培育现状及趋势研判

(一) 高素质农民培育成效

在学术研究层面,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根据各地差异性提出各具特色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多元联结”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三能力四模块”培育模式,现代合作型、现代智慧型或现代开放型培育模式等^[28-30]。学者们还分别提出了一些培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由“执行投入、执行策略、执行过程、执行成效、执行满意度”5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培育政策执行评估指标体系;从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效果层4个层面选取指标,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培育效果的指标体系;基于柯氏四级评估模型中学员反应、学习、行为改变建立了培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7,31,32]。还有学者以某一个地方的实践为例,提炼出高素质农民培育运行体系、运行机制,以及基于培训主体、动力支撑、运行机制3个方面构建起了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体系框架^[8,33]。

从实践层面看,农民教育培训成效显著。高素质农民队伍不断壮大,2020年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约2254万人,高素质农民超过1700万人^[34]。根据2020—2023年的《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测算,年均接受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人数约为80万人,受培规模相对稳定,培育机制更加健全完善、培育内容更加丰富,做到了分类实施、专项提升,发展态势良好,发展指数逐年提升,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发展指数领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平均年龄45岁,职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大中专毕业生、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等新生力量不断补充,高素质农民农业生产经营人均纯收入大于等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七成以上的高素质农民对周边农户起到辐射带动作用。从此看出,高素质农民已成为乡村振兴重要支撑力量,不仅为缓解“谁来种地”“谁来兴村”问题注入了新力量,也为农业强国建设、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二) 高素质农民培育困境

2021—2023年的《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指出了高素质农民培育面临如下困境:地方重视程度还不够、体系尚不完善、教育培训供给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大部分高素质农民产业基础相对脆弱,抵抗市场风险、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较低等^[35]。学者们也从不同层面指出了在当前高素质农民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授培组织服务供需错配,培育主体服务待提升。当前高素质农民培育存在组织不畅,多头供给、资源分散,供需脱节错位,条块分割严重,培育参与主体之间配合、沟通、协调不够,作为受众的农民参与度不足,第三方评价不够等问题。戴子洋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对高素质农民培育认识及理解不足,培育内容等设置不科学,培训需求与供给失衡,实培主体单一,师资力量薄弱。此外,农业农村部门资源整合力量有限,协调各方参与实施的力度不足,导致高素质农民接受的理论培训落地困难。

二是政策衔接性不高,培育环境待优化。相关政策“政出多门”,系统连接性不高。王玉华调研发现,在政策执行中一些地区出现了“协同性不足”“各自为政”,以及政策执行“碎片化”等问题,呈现出政策执行阻滞表征,影响了政策执行效果^[36]。此外,各个部门都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出台有相应涉农政

策,但对于要进行就业创业的高素质农民来说,他们既需要学历文化素质的提升、专业技能的提升,也需要人、财、物、地、技的支持,要使他们从各个部门出台的各类政策中找到适应自己需求的落地条款,难属易事。《2021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在有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民中,仅有13.6%的人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障,9.4%的人享受到城镇职工医保,在有贷款需求的高素质农民中,未获得贷款的人数占到了33.3%。

三是受培对象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培育客体遴选待强化。在全国2200多万人的乡村实用人才队伍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不到一半,这使受培对象生产经营及生产技能水平一时难以提高。张祺午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全国6亿农村劳动力中,高素质农民不足3.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不足13.0%,同时,大多数农村的产业化发展还比较滞后,青壮年农民选择进城务工比例较高,造成高素质农民培育中优质生源短缺严重^[37]。赵璐迪认为高素质农民培育对象综合素质偏低、培育主体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培育运行机制精细化程度不高、培育保障制度不完善等^[38]。此外,媒体关注度、宣传度不够,农民获取培育政策信息、意义与价值的宣传不够等,造成优质生源不足。

四是教育培训质量保障建设滞后,培育媒介有待强化。目前,尚存培育质量标准不完善、考核评价方式单一,重“训”轻“育”、重量轻质等现象。有学者指出,培训过程监管不够以及训后跟踪服务不到位等问题较普遍^[39]。李悦的研究表明高素质农民培育存在以下问题:在入口处,培育对象识别遴选精准度不够;在过程中,培育体系不完善,培育供给能力不强;在出口处,培训绩效难以有效评估,学员带动示范效应不强等^[40]。吕莉敏的研究则表明目前存在在评价目的上重“工具性”、轻“价值性”;在评价对象上重“培训者”、轻“受训者”;在评价标准上重“短期的、有形的效果”轻“长期的、无形的效益”等问题^[21]。例如,在《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绩效管理指标体系(2021年)》4个一级指标中“加分项最多10分”,其中,体现训后培育、陪伴服务功能的二级指标“服务发展”各分项总和不超过4分,一级指标“过程管理”中,仅“信息调度”一项二级指标分值就5分;一级指标“绩效结果”中,仅“数量任务”一项二级指标分值就20分。因此,从指标体系看,对训后培育、陪伴式服务设置权重不高,“育”的过程性体现不足。

(三) 高素质农民培育趋势

《“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及近年来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要点明确“十四五”期间要完成培育500万高素质农民的规划目标。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破解高素质农民培育所面临困境,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育质量,需要理论结合实际,加快构建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新格局、营造农民教育培训良好氛围,需要科学把握高素质农民培育趋势^[24]。

在学术界,吕莉敏清晰指出,未来高素质农民培育在评价理念上要坚持整体化与个性化的统一,突出个性化评价,在评价功能上要坚持工具性与人本性的统一,突出评价的发展功能;在评价对象上要坚持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的协同,突出受训者评价,在评价指向上要坚持效率和效益相结合,突出循证过程^[21]。已有政策指导及学术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借鉴。基于此,本文认为未来高素质农民培育趋势呈现为四个“健全”:健全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法规体系、健全高素质农民培育组织管理体系、健全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健全高素质农民培育考核评价体系。

四、以河南某大学为例：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架构及细节把握

基于前文所述，在此以河南某大学为例，探索“3311”培育体系实践的经验，用以验证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实践与理论论述、历史逻辑的契合性。

（一）高素质农民培育“3311”体系架构

参考国内外职业农民培育典型经验，以主流理论为依据，河南某大学结合本校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际运行状况，遵照育前、育中、育后的现实逻辑，构建了“3”个保障条件、“3”个阶段、“11”个重要环节的“3311”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如表5所示）。

表5 河南某大学“3311”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

设置逻辑	设置框架	具体内容
育前准备	3个保障	(1) 高素质农民培育组织管理 (2) 产教融合的校外实践基地 (3) 制定模块课程库
育中实施	3个阶段	(1) 培育策划阶段 (2) 培育组织实施阶段 (3) 培育延伸阶段
全过程管理	11个环节	(1) 育前三个环节：理念更新、培育组织创新、精准遴选学员 (2) 育中四个环节：培育内容、培育形式、培育师资、学员考核 (3) 育后四个环节：质量评价、“陪伴式”跟踪服务、培育效果检验、培育信息反馈

1.建立三个保障

（1）高素质农民培育组织管理

按照资源整合、共建共享、训育衔接的基本思路，创建以“农民发展学院”为载体、“政府+院校+企业”多方参与、“教育+扶持”有效融合的培育组织。目前已建立了类似于美国“农民工人”培育目标的N县农民产业学院和类似于日本“农场主”培育目标的M县农民产业学院等。

（2）产教融合的校外实践基地

按照“突出特色、注重实效”的原则，与省内知名企业共建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基地，联合共建远程互动数码实训平台，通过实景操作、远（近）程互动，为农民提供全产业链重要环节实时指导。

（3）制定模块课程库

根据国家《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科学设置了综合素质模块、生产技术模块、经营管理模块、创业经验交流模块四个模块，并制定模块课程内容（如表6所示）。

表6 “3311”培育体系模块课程库

模块类型	核心课程
生产技术	规模化养殖场规划、家畜规模化饲养新技术、家禽规模化饲养新技术、经济动物饲养管理新技术
经营管理	农业企业融资专题、家庭农场经营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管理、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民手机应用、品牌化建设
综合素质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法律基础与农村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文化素养、乡村治理、农业通识、领导艺术、高效沟通技巧、打造高绩效团队
创业经验交流	现代农业创业、创意农业、美丽乡村建设、案例分享

2.划分三个阶段

依据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流程，将培育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培育策划阶段，突出培育理念更新、培育组织管理体系建构和培育对象遴选，为精准培育打

下基础。

二是培育组织实施阶段，重点突出培育内容的设置、培育形式的使用、培育师资的选配和考核方式的创新等，确保培育靶向精准。

三是培育延伸阶段，重点突出培育工作质量评价、训后陪伴服务和培育效果检验等质量跟踪和反馈，实现培育效果与培育实施的良性互动。

3.设置十一个环节

(1) 育前三个环节：理念更新、培育组织创新、精准遴选学员

第一，培育理念更新。培育基地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育理念，深入调查培训客体应具备的能力和参训学员的实际需要，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兴农、品牌强农”为培育指导思想，结合成人学习特点，采用产教融合培育方式来策划每个类型的培育。

第二，组织体系的选择。根据学员当地产业特点和发展趋势，确定培育目标，并选择或者新建合适的农民发展学院，加强在学员推荐与遴选、培育内容优化、培育师资整合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培育成效。

第三，培育对象的精选。该培育体系根据学员的基本素质、能力水平、产业水平、对农业的信心与期望等四部分16个指标来遴选学员，并根据不同指标对培育效果影响赋予每个指标不同权重（如表7所示）。

表7 培育对象遴选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占比
1. 基本素质	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技术水平、职业培育	20%
2. 能力水平	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公司或社会职务、社会荣誉	30%
3. 生产水平	年农产品销售额、品牌化、组织化、废物合理利用情况、信息化水平	40%
4. 对农业的信心及期望	对国家补贴政策关注程度、对金融保险政策了解程度、对未来农业发展的信念、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程度	10%

(2) 育中四个环节：培育内容、培育形式、培育师资、学员考核

第一，科学设置培育内容。在设置培育内容之前要对学员的偏好性进行调查，依据不同需求，从综合素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创业经验交流等4个模块中选取不同模块按一定比例组成不同培养方案。例如，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现代青年农场主、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三类对象的培育方案制定（如表8所示）。

第二，丰富培育形式。针对成人学习特点，围绕培育内容，通过校地联动、产教衔接、基地示范等方式，选取现场教学、实操演练、专家问诊、技术指导，线上答疑等多种培育形式，实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室内与室外相结合、专家指导与学员互助相结合。

第三，整合四类师资。根据培育需要，整合四类师资力量：熟悉培育政策的行政机构管理人员（占比约10.0%）；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占比约50.0%）；基层农业教育培育部门的专业师资（占比约10.0%）；农业企业家、涉农创业者、合作社负责人、成功家庭农场主（“土秀才”“田专家”）等农业从业者（占比约30.0%）。

第四，创新学员考核方式。根据培育内容，采用现场演练、技能操作、创新创业竞赛、网上沙盘演练等多种考核方式，将过程阶段考核和结业综合考核相结合，提高考核精准性，真实反映学员学习效果。

表8 培育类型及相应培育模块

培育类型	培养目标	主要内容	培育模块及比例				培育方式
			综合素质	生产技术	经营管理	创业经验交流	
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领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能力	农业行业现状与未来趋势、提升素质、加强品牌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20	20	40	20	理论讲授、跟踪服务
现代青年农场主	知农爱农、激发创业热情、提高农业创业能力	政策讲解、技术指导、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激发	20	20	20	40	现场模拟、跟踪服务
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提高其带头增收致富本领和示范带动能力	当好村干部、农业法规、生产技术、规模经营、特色农业、品牌创建、创新创业等	40	20	20	20	案例研讨、现场教学

(3) 育后四个环节: 质量评价、“陪伴式”跟踪服务、培育效果检验、培育信息反馈

第一, 培育质量评价。质量评价是为了评价培育的组织及过程是否规范、成效是否显著, 也是培育机构对照完成自我检测的依据。主要按照培育策划、培育保障、培育实施、培育效果等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进评价与监督(如表9所示)。

第二, “陪伴式”跟踪服务。组建政策设计者、创业咨询师、行业专家、成功企业家、优秀创业学员等为主体的培育服务团队, 利用微信群、钉钉群等渠道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指导与市场信息, 帮助学员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

第三, 培育效果检验。培育结束后根据学员理论成绩、操作能力和满意度等, 对培育整个过程进行评价。一年期内, 以学员生产经营状况、信息化程度、品牌化水平等对培育工作进行评价。两年以后, 以学员服务带动小农户、荣誉示范农户的数量及社会认可度对培育工作进行评价。

第四, 培育信息反馈。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学制学员的育后效果检验信息, 反馈至育前、育中工作, 形成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自我完善动力机制。

表9 “3311” 培育体系质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观测点	信息应用
培育策划	方案依据	是否依据了国家的宏观培育政策、是否依据了区域农业发展、是否依据了政府培育要求	确保培育方案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制度保障	是否对培育学员进行需求分析、是否分析了农民学员存在的问题	
	经费投入	教学制度、人员配备及职责分工、教学服务保障与管理是否清晰合理	
	培育方案	培育经费投入情况与财政评审和预算是否一致	
培育保障	培育师资	培育方案内容的科学性、逻辑性和针对性, 包括培育目标是否清晰、培育时间安排是否合理、培育内容与培育目标是否一致、培育形式是否科学	保证培育实施有序推进
	条件保障	教师的年龄结构、资质水平、影响力和教学水平	
	组织与管理	学员的食宿安排、交通安排、日常生活服务、场地与设备等培育需投入的物质保障条件	
	教学与指导	培育实施过程的管理是否有序、质量过程监控和反馈机制是否健全、日常管理与考核(考勤、作业等)是否有效, 以及是否能够及时固化培育成果	
培育实施	监控与调整	培育教师的教学准备和教学活动, 参训学员在教学与指导过程中的参与和体验, 以及提供专业指导服务时是否及时有效	运行实施
	项目达成	项目团队是否对项目的实施进行过程监控, 能否根据参训教师在培育实施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建议与实际及时对方案作出调整, 以及对培育方案的调整与变更是否有记录等	
培育效果	项目达成	参训者对课程内容、培育形式、考核制度、培育队伍, 以及培育时间、地点、教学设备、环境和培育教学管理与教学服务等方面的整体满意度	培育反思

(二) 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验证

1. 培训满意度方面

学员对培育方式、培育内容、培育师资、培育设施、培育组织和后勤保障都较为满意,满意率均在95.0%以上,比体系运行之前有显著提高($p<0.05$),同时比全国相应水平高出15.0%,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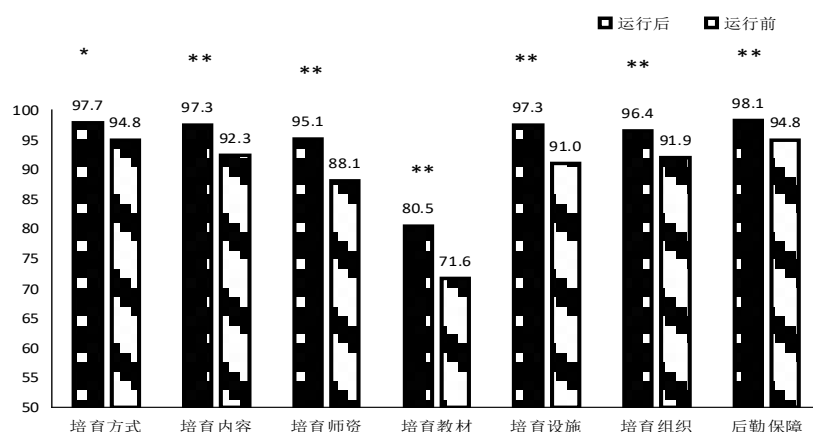


图3 培训前后学员满意度对比

2. 个人受益方面

学员更加注重教育和身体健康,体现为参与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的比率较培育之前有了显著提高,具有不良嗜好(熬夜、抽烟、酗酒等)者的比率有了显著降低,差异极显著($p<0.01$);在产业水平上,42.2%的学员扩大了经营规模,46.5%的学员提高了家庭收入,同时农产品年销售总额达到10万元及以上的学员比例为99.4%,比培训之前均有显著提高;学员品牌化建设步伐逐步加大,28.7%的培训学员拥有“三品一标”绿色农产品标识,62.7%的学员采用滴灌或喷灌等节水技术,67.6%的学员减少了化肥或农药使用,70.8%的学员将畜禽粪便进行了有机化处理,较培育之前有显著提高($p<0.01$);信息化水平方面,学员培训后,线上农业生产经营有明显增加,差异极显著($p<0.01$)(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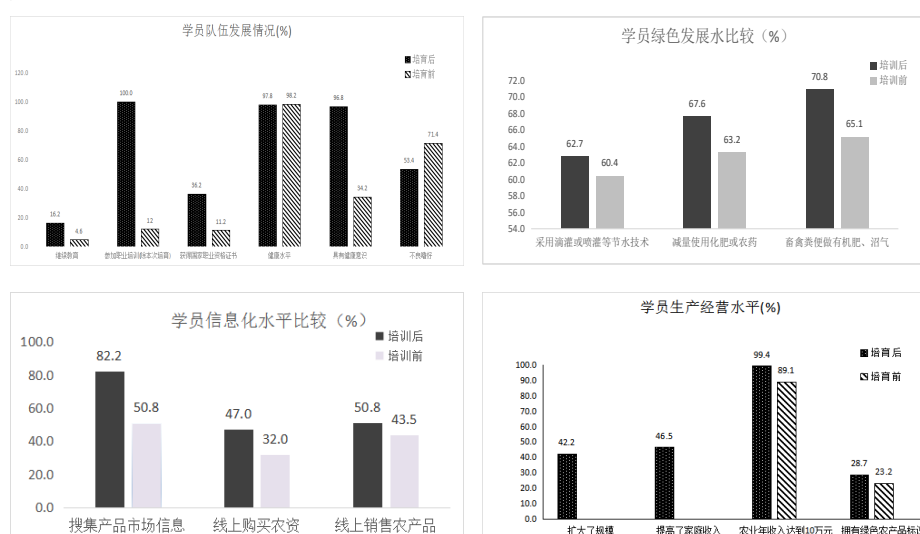


图4 培训前后学员个人受益情况对比

3. 社会责任感方面

通过教育培训,参训客体的社会责任感有较大提高,带动作用有显著提升($p<0.01$)。92.4%的学

员对周边农户产生了示范带动作用，此数据提高了7.6%。其中68.7%的学员为周围畜牧养殖户开展技术指导，36.8%的学员组织小农户统一购买农资，41.6%的学员组织小农户统一销售。这些辐射带动作用，助推了当地农业组织化发展，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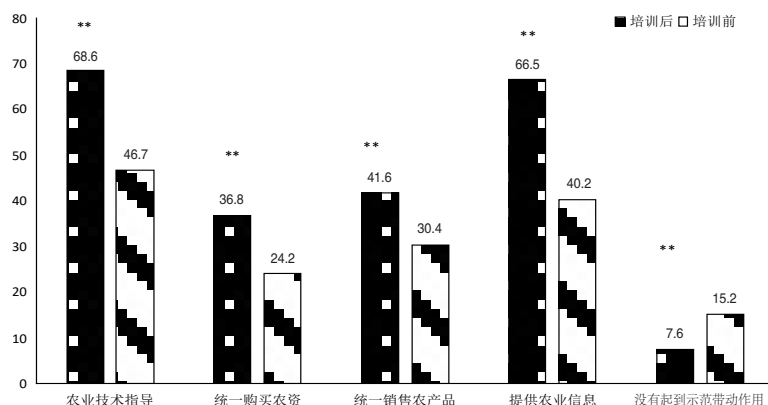


图5 培训前后学员社会责任感对比

（三）高素质农民培育细节把握

构建“3311”培育体系需在做好顶层设计基础上，坚持目标导向，根据高素质农民自身素质、社会角色、所处环境、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把握好培育对象遴选、培育内容设置、培育师资配备、培育方式方法优化等四个方面细节。

1.精准遴选培育对象

一是利用融媒体，扩大培育学员遴选范围。运用抖音等人们喜闻乐见、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媒体手段，面向全社会发布国家关于高素质农民培育信息，跨越地域局限。

二是对涉农专业在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意识形态教育。增加学生职业使命感，使在校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农业意义和价值，看到乡村振兴对大学生的迫切需要和为大学毕业生提供的广阔发展前景，使其成为高素质农民后备军。

三是加大农业从业者的再教育力度，积极促进三产融合。如农机手、植保员、兽医师、质量安全监督员、农村信息员、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农业从业者，他们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知识更新的愿望更强烈，可作为重点宣传、遴选对象。

四是运用科学手段，按需设班。针对影响培育效果主要因素，如年龄、学历、经济收入、信心及满意度、授课内容、授课形式、培育时长、培育季节等，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显著影响培育效果的因素，提高培育对象遴选的精准性。

2.精准设置培育内容

结合经营管理型、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三种类型受训对象特征，精准设置培育内容。

一是设置综合素养模块。以思想政治、农业通识、“三农”政策法规等为主要内容设置综合素养知识模块，培育其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理解和感受。

二是设置建设美丽乡村模块。以乡村治理、科学发展、乡土文化、勤劳节俭、孝老爱亲等为主要内容设置美丽乡村建设模块，提升其社会道德素养，为形成良好的乡村人际关系奠定基础。

三是设置专业技能模块。主要包括关于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管理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以及标准化、市场化、信息化和质量安全要求等,使其掌握生产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

四是设置经营管理模块。主要包括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创新创业、品牌创建、融资担保、法律法规、组织沟通、社会服务等,使其增强现代农业企业管理运营能力。

五是设置经验交流模块。主要是介绍成功典型案例,分享发展成果,交流成功经验,增强培育工作的现实操作性,重视身心健康,确保其具有创新创业的本钱。

3.精准配备师资队伍

一是乡村振兴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利用其对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解读乡村振兴的历史背景、现实意义、发展现状与前景、对世界贡献和影响等,提升高素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信心。

二是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教授。从思想道德教育、文化传承、心理辅导方面提供价值塑造支撑,围绕“三农”发展,为高素质农民提供广泛的知识、信息、技术服务。

三是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管理人员。结合对“三农”政策理解、实施、调研情况,解读“三农”政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四是农业基层技术人员。聘请“田秀才”“土专家”走进课堂言传身教,传授长期从事农业一线的实践经验,与受培对象产生情感共鸣。

五是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先进典型。让成功者走上讲台,可以调动农民自我教育、自我分享、自我发展的内在积极性,发挥典型的辐射带动作用。

4.精准选择培育方式和途径

一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开发线上学习资源,由农民按自己时间安排线上学习,使农民学习更加便捷。

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讲授的基础上,安排充足的实践教学,如安排实地参观、实训,或运用现代远程技术对实践教学基地的生产流程进行全程实时直播,增强培育直的感性和生动性。

三是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相结合,实现“双主体”育人。发挥涉农企业参与积极性,推进校企融合。采用“企业+基地”“基地+学员”“企业+学员”“学校+企业”等形式开展培育,或以工代训,实现农民学习不离家、不离厂,帮助农民就业,帮助农业企业解决招工难、留人难问题。

四是搭建涉农科技信息供需服务平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科技供需信息库和专家库,创建线上“高素质农民培育陪伴服务120”,让专家“坐诊”答疑解惑,实现简单问题与专家“单线私聊”,复杂问题听专家“同屏会诊”,畅通科技精准供给途径。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阐述在乡村振兴、农业强国战略布局下,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的构建及运行。从国家政策、学术研究两个层面,提出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内涵及特质,梳理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认为农民素质培育演变过程表现为传统农民—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其演进的现实逻辑主线为从“谁来种地,怎样种地”到“谁来治村,如何兴村”再到“谁来引领致富,如何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分析高素质农民培育成效及困境,从政策法规、组织管理、教育培训、培育考核评价等四个方面探讨未来趋向。文章最后以河南某大学为例,探索“3311”培育体系的实践价值,并从精准遴选培育对象、精准设置培育内容、精准配备师资队伍、精准选择培育方式和途

径等四个维度提出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运行中应注意的细节把握。高素质农民培育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主题,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文难尽全貌。未来可在高素质农民培育过程监管、高素质农民培育绩效定量分析、国内外高素质农民培育差异性比较、高素质农民培育对农业强国建设支撑的学理解析等方面深入研究。

注释

①检索日期截止2024年3月9日。

②建德市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关于印发《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和《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绩效管理指标体系(2021年)》的通知(农科(教育)函〔2021〕16号)[EB/OL]. (2021-12-14)[2024-03-07]. https://www.jiande.gov.cn/art/2021/12/14/art_1229416056_59112423.html.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EB/OL]. (2017-12-16)[2023-03-17].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202302/t20230206_1902105.html.
- [2] 新华社. 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12.93%[EB/OL]. (2023-09-01)[2024-3-07].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1485.htm.
- [3] 李卓异, 赵丹, 马书琴. 乡村人才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培育研究[J]. 成人教育, 2023(12):39-46.
- [4] 彭超. 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的演变、效果与完善思路[J]. 理论探索, 2021(1):22-30.
- [5] 李谷成. 高素质农民新概念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新内涵[J]. 理论探索, 2021(1):6-7.
- [6] 李莉, 张俊. 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三重逻辑与路径指向[J]. 成人教育, 2023(2):37-43.
- [7] 温涛, 陈一明. “互联网+”时代的高素质农民培育[J]. 理论探索, 2021(1):12-21.
- [8] 袁华根, 丁丽军, 蒋平, 等. 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三能力四模块”模式构建:以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为例[J]. 职教通讯, 2021(3):83-89.
- [9] 吕莉敏, 石伟平. 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评价:应然追求、实然之困与未来方向[J]. 职教论坛, 2023(9):68-75.
- [10] 张贻茜, 朱丽娟. 政府主导下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比较研究[J]. 新疆农垦经济, 2024(5):3-43.
- [11] 杨璐璐, 王怡. 基于共词分析的农民培育政策量化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9):84-96.
- [12] SUWEN F.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High Quality Farmers[J].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2021(2):22-30.
- [13] 孙伟, 任念文.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高素质农民培育探究[J]. 山西农经, 2021(15):172-173.
- [14] 于兴业, 张迪. 数字劳动视域下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价值外延与发展路向[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3(6):96-106.
- [15] 李雪. 信阳市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评价研究[D]. 郑州: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4.
- [16] 龚武滨. 农民教育培训效果评价问题研究[D]. 南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23.
- [17] 李洪岩. 乡村振兴下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运行机制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 2023.
- [18] 孙在福, 王瑞峰. 多维度结构视角下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实现机制[J]. 中国成人教育, 2022(16):72-80.
- [19] 赵永红. 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民田间学校模式探讨[J]. 农业经济, 2020(11):89-90.
- [20] 刘奉越, 李洪岩. 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演进、模式及行动逻辑[J]. 职教论坛, 2022(12):84-91.
- [21] 耿玲. 培育高素质农民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以兰州市农广校“12335”农村远程教育模式为例[J]. 甘肃农业, 2020(6):104-105.
- [22] 王云清. 新型职业农民产教融合培育模式的建构与创新实践[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36):53-57.
- [23] 杨雨润. 高素质农民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D]. 沈阳: 沈阳农业大学, 2023.
- [24] 唐开鹏, 张军. 高素质农民职业使命培育研究[J]. 农业经济, 2024(1):105-106.
- [25] 张桃林. 构建新格局开创新局面推动农民教育培训持续高质量发展:在第三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上的主旨

- 报告[J]. 农民科技培训, 2021(1):7-13.
- [26]徐进, 康芳. 乡村振兴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1(1):83-89.
- [27]丁刘慧子, 吴则东, 倪洪涛.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旧农人结合问题的思考[J]. 中国农学通报, 2021(3):160-164.
- [28]张亮, 樊梦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职业农民“两新融合”机制构建[J]. 河北学刊, 2022(4):154-161.
- [29]李晓红, 李正江. 多元联结: 乡村人才振兴视域下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创新: 基于G省的案例分析[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30):21-27.
- [30]奚照寿, 丁丽军, 袁华根,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三能力四模块”培育模式创新实践: 以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 2021(14):1-5.
- [31]张淑苹.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1.
- [32]闫淑玲, 李玲.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执行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23(15):89-96.
- [33]邓昊宇, 李成民, 宋玉兰. 少数民族脱贫地区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J]. 中国农机化学报, 2023(7):264-272.
- [34]姚文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体系建构[J]. 农业经济, 2020(10):77-79.
- [3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全国农村实用人才约2254万人[EB/OL]. (2020-11-20)[2023-12-07]. https://www.gov.cn/xinwen/2020-11/20/content_5562824.htm.
- [36]国家乡村振兴局. 打造乡村振兴的“主力军”《2022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发布[EB/OL]. (2023-01-13)[2023-12-11]. <https://www.chinacoop.gov.cn/news.html?aid=1768319>.
- [37]王玉华.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执行阻滞及化解之道[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6):62-67.
- [38]张祺午.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构建的基本理路[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30):15-20.
- [39]赵璐迪.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高素质农民培育理论逻辑与实践理路[J]. 成人教育, 2022(12):42-50.
- [40]戴子洋. 乡村振兴战略下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提升路径研究[D].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2023.
- [41]李悦, 金满文, 钟品妍. 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理论意蕴、现实藩篱与路径指向[J]. 农业经济, 2023(3):81-83.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System of High-quality Farm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EI Xingxing^{1,2}, YANG Zhiqing¹

(1.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450011, Henan;
2. He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2, Henan)

Abstract: With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n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quality farmers and their cultivation from both national poli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perspectives. It delves into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ehind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farmers, tracing the evolution from traditional farmers to professional farmers, new farmers,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and ultimately, high-quality farmers. The core development shifts from focusing on “who farms and how farming is conducted” to “who governs the village and how to develop it,” and currently to the emphasis on “who leads in achieving prosperity and how to achieve shared prosperity.” Furtherm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utcomes and challenges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farmers, discussing future trends in areas such as policy regulation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3311” cultivation system for high-quality farmers that prioritizes precise candidate selection, well-designed content, excellent teaching teams, and scientifically sound cultivation methods, further guiding futur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research endeavor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high-quality farmers; cultivation system; the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shared prosperity

【责任编辑 张永芳】